

## 3.10 人子與人臣： 戰後家書中的蔣經國和國民黨政治

王良卿 暨南國際大學助理教授

### 一、前言

長期以來，對於蔣經國一生感到興趣的傳記作者，多半將傳主在抗戰結束後數年之間的作為，進行某種圈地自限的描述，亦即幾乎都將主要的觀察視野劃定在 1945 年的東北問題交涉，以及 1948 年的上海經濟管制方面。這兩件事因而似乎成為某種牢不可破的藩籬，離此一步，讀者不太可能擁有更多的機會了解更多的蔣經國。<sup>1</sup>毫無疑問，兩個事件在當下，都把蔣經國推到了國民黨人和公眾的注目之下，事件本身也深深牽動了戰後中國局勢，這肯定吸引了傳記作者的注意。不過，史料問題可能也導引、深化了上述視野過於集中化的現象，特別是日後台灣威權統治時期，蔣經國先後發表紀日體裁的“五百零四小時”、“滬濱日記”，正是以東北交涉、中蘇談判，和上海“打老虎”為焦點，主動發聲，從而在一手資料短缺的年代，喚醒／劃定，甚至再建構了人們對蔣經國戰後“戮力黨國”的認知與視界。<sup>2</sup>

今日，擴展蔣經國的戰後研究面向實有必要，其理由並非是要翻轉以往研究成果在學術凝視方位裏所形成的典範性角色，恰恰相反，對於蔣經國的政治事業而言，戰後時期作為承先（承接抗戰時期的政治起家經驗）、啓後（下轉兩岸分治後的台灣歲月）的關鍵性年代，學術工作者惟有站在前人的研究、更為多元的凝視方位，以及掌握現已面世的更多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才能做出更富有意義的總體評估，也才可能不致忽略歷史長河當中任何有助於解釋傳主活動的微觀線索。目前，國史館業已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其卷宗分類項下一直受人忽視的《領袖家書 • 蔣經國先生家書》，就有機會填補歷史學界對於前述總體評估和微觀線索的雙重需求。

這一批蔣經國家書絕大部分以蔣介石為函陳對象，起自 1937 年，迄至 1952 年，尤以戰後時期，特別是 1947、1948 年書寫最勤，蔚為大宗，唯 1946 全年的檔案付之闕如。<sup>3</sup>家書內容並非總是流於晨昏定省的制式化問安，事實上，它經常涉及了家族事務，甚至毫不保留的，極為大量的，主動表露了一位“人子”駐足中國政治權力場而亟待宣洩

的、敏感易碎的內心世界，以及一位“人臣”對於國民黨黨國事業的思慮（在家書編織的語境當中，人子與人臣的身分經常是流動、融會，難以析分的）。從這些一手的私密函件裏，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蔣經國如何即時向他的父親表達對於黨國體制某些政治菁英的看法、對於秘密組織與特務工作的特殊興趣等等。對於蔣經國家書的研究，本文尚屬初步嘗試，限於篇幅、才力，並非全盤介紹之作，而係就這批家書反映蔣經國和戰後國民黨宗派政治的若干關係，特別是就蔣經國政治上升之路上自我認知的障礙，及其親信傳述甚廣但從未獲得一手史料證實的秘密組織，進行初步的爬梳、抉微，期能增益研究面向。

### 二、書寫兒艱：政治上升及其障礙

蔣經國在 1937 年結束蘇聯的十二年滯留生涯返回中國，翌年經過正式批准成為國民黨員。<sup>4</sup>然而截至 1947 年夏天為止，蔣經國仍未真正進入國民黨黨機器上層。在此之前，他的主要政治職位除了贛南的地方行政工作之外，其實繫於抗戰期間蔣介石所發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與青年軍。暫就三青團的經歷而言，1941 年，蔣經國躍為中央幹事，這個職位略可類比於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抗戰後期，遞補成為中央常務幹事，粗可類比為國民黨的中常委。戰後，1946 年 9 月，蔣經國在三青團中央幹事會的排序升至第二，僅次於陳誠；10 月，獲蔣介石拔擢，擔任三青團中央統攬組織、訓練工作的第二處處長，這個位子類同於陳立夫在國民黨內的主要職務，即中央組織部長。<sup>5</sup>

#### (一)

戰後蔣經國位居三青團要津，尤其總縮組訓事務，雖然貌似掌握實權，但其親信蔡希曾卻說“實際上是頭重腳輕，浮而不實”，“在青年團最後的一段歷史上，蔣經國所留下的，又是一頁灰黯的挫敗記錄”，蔣經國亦向其父自承“為兒自服務黨國以來最大之失敗”。<sup>6</sup>箇中癥結，在於三青團成立之初，黃埔系、復興社勢力即取得主控性地位（以三青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陳誠、前組織處長康澤等為代表性人物），康澤在地方團部更已打下盤根錯節的組織人事基礎，蔣經國在第二處即使不能說是一個“空頭處長”，但其指揮號令確實難能暢意。

蔣經國上任之初，即請來昔日留俄同學俞季虞擔任主任秘書，親信徐炳南、蔡希曾亦受邀到處辦事，不過立遭團內人士側目，遭批評為“蔣處長室三人小組”；蔣經國個人則鮮少露面，這和康澤積極投入團務的熱情不能同日而語。<sup>7</sup>接篆歷三月，這位新任處長感觸已多。1947 年 1 月，時逢農曆除夕夜，蔣經國獨坐南京勵志社二樓居所，和杭州的方良、孝文、孝章通過電話後，隨即給蔣介石寫下一封近乎“告御狀”的家書。儘管他謹慎維持平和的筆調，自認“心情甚為安靜”，卻也不失明白的陳述了三個月來

與陳誠等“青年團領導者之基本觀念不能一致”，認為這才是三青團工作“始終難以展開”的“根本問題”：

兒始終認為青年團應為廣大青年羣眾之生命與精神所寄托之集團，繼而成為三民主義革命之新力量，故無論幹部之選擇與工作之方向，皆應注重於青年精神之發揮。而青年團之領導者想將青年團變成少數人之政治資本與鬥爭工具，故最近來之人事佈置（重要人事之調動，皆未徵求兒之意見，且多為兒所素不相識者），以及各種指示，無不以派別鬥爭為出發點。陳書記長最近曾對各級幹部指示，謂“今年為選舉年，選舉譬如作戰，本團未來之戰場有三：一為國大代表之選舉，二為立法監察委員之選舉，三為省縣參議員之選舉”，兒意今年青年團如以選舉作為工作之重心，則不但將與黨部發生衝突，即青年團本身亦必走入官僚化之路而脫離羣眾。兒自參加青年團工作以來，自問始終遵照 大人訓示，抱誠懇坦白之精神，努力於本位上之工作。今後在青年團內，兒祇要有一天工作之機會，即將努力一天，但實際情形則不得不向 大人呈明，以供參考。<sup>8</sup>

身為國民黨黨國事業下的一名政治新人，蔣經國的團務經歷非常自然的成為其“政治資本”積累過程裏的重要一環，非祇信函所稱專注於“青年精神之發揮”。<sup>9</sup>進一步說，這封家書足堪令人玩味之處，一方面在於：它是較早的抉發了“蔣（經國）陳（誠）關係”的一篇自剖式文獻；另一方面則在於：陳誠談三青團的組織原則，原本就有“頭是身體最重要的部分，組織部【處】有如口，但口不能大過頭”的看法，階層嚴明的領導觀念相當明顯，<sup>10</sup>但是蔣經國直入組訓部門的政治上升及其任職感觸，不啻從一個權力分配／再分配的斷面，揭示了這位令人注目的政治新人與黨國既有統治菁英羣之間的某種內在緊張狀態。

## （二）

至少在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時期，這種內在緊張狀態絕對不因蔣經國的鮮明、有力家世背景而告消滅。進一步言，這種家世背景以及蔣介石栽培子嗣的心念，倒是經常成為他人側目再三的現實根源。政治大學教育長任命風波即是又一個明顯的例子。1947年4月，蔣經國接充政大教育長一事導致校內學生反彈，抗議聲浪指向蔣氏父子，直有“黨校”退化為“家校”之譏。政治大學由黨方的中央政治學校、團方的中央幹部學校整併而成，政校為存續單位，幹校為消滅單位。蔣經國原為幹校教育長。人們大多認為本次國民黨自身校園的騷動事件係由黨方的陳立夫所發動，無論是否如此，以原政校主流派排拒“太子”的心理醞釀所致，殆無疑義。<sup>11</sup>稍早，蔣經國已就“改進政治大學校務”議題進行思考，並邀集原幹校教授會商，打算有所展布；<sup>12</sup>及至政大風潮發生，修書告其父，自謂“兒已數夜未得安睡”，“兒之所思慮者，決非個人問題，乃兒深知 大人近年

來為國憂煩之深重”：

此次因兒代理政治大學教育長而發生之學潮，不但使 大人煩心，而且有損大人之威望，為兒者不孝之罪大矣。此事之發生，使兒對於本身之處境，以及事業之前途得能有更進一步之認識，實有所警惕也。<sup>13</sup>

三青團與政大的人事挫折經驗，導致敏感的蔣經國從中國的公眾視野當中，尋求暫時性的撤退（日後投身上海經濟管制一事則是僅見的例外）。1947年夏天，蔣介石為整合內部力量，祭出國民黨與三青團合併的重大決策，即黨團統一。根據《統一中央黨部團部組織案》的規定，蔣經國得以三青團中央幹事、中央常務幹事的身分，對等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常務委員，這是他晉身黨機器上層的嚆矢。<sup>14</sup>在此前後，人們注視着蔣介石是否將更進一步賦予其子有關黨務部門的方面重責，不過實情是，蔣經國很早就以“目前之人事關係”為慮，向他的父親表達了不願擔負“名義”的態度，7月26日家書：

兒自服務青年團以來，已將一年，毫無成就，為兒自服務黨國以來最大之失敗，未能達成 大人之期望，內心惶恐異常。黨團合併後，兒願盡一切促成黨之新生，而在名義上則不想負責。而以目前之人事關係而論，亦以不參加表面上工作為宜。<sup>15</sup>

9月，蔣經國再次敘明了相關態度。先是黨團統一運動展開期間，輿情感以刷新人事相期於國民黨，但實際上，黨、團兩造則以本位主義互施人事攻訐。凡此種種，作為國民黨組織工作重心與派系首腦的陳立夫，自然不免首當其衝。5月，亦即東北等地戰事繃緊、後方學潮正熾之際，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已向美方傳報陳立夫的組織部長職位告急的消息。陳立夫個人面臨的政治危機，至少與同時間國民黨無法應付後方失序的局面，以及地方黨團惡鬥有關。據稱，蔣介石甚至一度責令陳立夫擬定中央組織部長的代理人選。然而基於若干現實考量，蔣介石暫時讓陳立夫留在原位，並且婉拒美方迫陳出洋的提議。<sup>16</sup>隨後，黨團統一運動開展後，則讓陳立夫再度陷入難堪的境地：有些人視他為改革的障礙，有些人則視他為團結的絆腳石，直令其處處得咎。9月5日，陳立夫向蔣介石請辭中央組織部長。<sup>17</sup>

對於陳立夫請辭一事，連同黨團統一運動勢必牽動中央黨部各主管的異動，黨方與團方幹部立刻掀起了新一波的利益爭奪，雙方壁壘分明，難能調和。在中央組織部長繼任人選方面，媒體披露的熱門名單包括：黨方支持的余井塘、谷正鼎、谷正綱等，團方的張治中、鄭彥棻、康澤、袁守謙、蔣經國等。<sup>18</sup>在蔣經國這邊，無論是否接到他父親的徵詢，藏鋒斂鐔的態度仍然一貫。12日，他以一年來處處遭遇“排擠”、“反對”的不快經驗為由，再次修書提醒蔣介石：

今日在黨部改組之時，懇請 大人不派兒擔任黨部中負有名義之工作。兒決非畏難而退讓，實顧及 大人處境之難也。兒於去年出任青年團組織工作時之受人排擠，於今年出任政校教育長時之遭人反對，如此小事並非因兒小氣而不忘於心，而實值深加研究與注意者也。<sup>19</sup>

14日，蔣介石約見中常委谷正綱（CC系，蔣經國留俄同學），當面委以組織部長職位。一天後，谷正綱以函呈推辭了蔣介石的委任。同蔣經國一樣，谷正綱也估量了個人難能“因應各方”的短處，並且也向蔣介石暗示了身為一個幹部周旋於當前黨團現狀至為不易的憂慮。至是組織部長接充人選陷入難產，最後，陳立夫暫時保住了這個職位。<sup>20</sup>

### (三)

1948年，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在相對多數的選票支持下，擊敗蔣介石屬意的立法院長孫科，當選行憲第一任副總統。對此，蔣經國函告其父，引為“最大之恥辱”，預言“今後國家必將多事，最艱難之鬥爭，恐亦將始自今日矣”。<sup>21</sup>事實上，李宗仁力擯孫科而告當選的原因非祇一端，如果單就國民黨人的反動心理而言，則是大大涵蓋了黨籍國大代表對於中央統制性格的消極不滿，以及針對負有輔選孫科任務的陳立夫的積極反制。<sup>22</sup>選舉結果自非蔣介石所樂見，黨員脫逸秩序的投票分裂行為，尤其令他至不能忍；對於肩負輔選工作的陳立夫而言，亦屬沉重打擊。5月1日，也就是副總統選舉過後兩天，蔣介石約見陳立夫，明白告示這位中央組織部長，應該為黨籍代表在國民大會開會期間玩忽黨令黨紀等脫序行為，扛起政治責任。<sup>23</sup>

當晚，蔣經國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商談國民黨的改組相關事宜。改組可能包括人事、組織二端，此事出於蔣介石囑咐研商，則可確定。2日，陳立夫的辭呈送達蔣介石的官邸。<sup>24</sup>八個月內，陳立夫二度請辭中央組織部長，這一次甚至同時訴請卸下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職務。辭呈內容頗堪令人玩味，陳立夫沒有正面回應蔣介石對於國大代表投票表現的指責，反而歷數近來辦理黨團統一、黨員團員重新登記、國大立委選舉指導等多項工作，障礙重重，“所幸國大順利開成，且已圓滿閉幕，今後政治、黨務均將進入一新階段，行新政，用新人，請自本黨中央開始，尤請自中央組織部始，伏乞俯鑒愚忱，即准辭去組織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職，不勝迫切待命之至！”<sup>25</sup>

陳立夫的辭呈未了，所提“行新政，用新人”一句，實係李宗仁參選副總統期間廣為人知的助選陣營口號。揆諸辭呈該句的上下文意，似見流露情緒。<sup>26</sup>事實上，蔣介石確有大膽“用新人”的打算。在兩天之內，他徵詢了蔣經國出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意願。蔣經國長考後，以家書向他的父親表達婉拒之意。4日，函稱：“兒近日來默察國內情勢，認為最可慮者，厥在全國範圍雖如此之大，幾無一地可作為 大人之革命事業真實基礎，而每值國家重要關頭，其能對 大人矢志忠誠者，亦不可多得。故時至今日，整

頓黨之組織，藉以團結忠誠之同志，實為第一要務。 大人徵詢擔任組織部長一節，經再四思維，值此艱苦危亂之際，自應量力以為，蓋若干年來，兒對於工作，從未為之選擇，且亦無任何顧慮。”然而，蔣經國強調“今日為 大人計，為本黨計”，不得不促請他的父親考慮以下各點：

一、最近共匪以國民黨稱為“蔣黨”，如以兒擔任組織部長一職，恐將授共匪在宣傳上以口實。二、黨內派別日見紛歧，如兒出任斯職，外間必將認為 大人除兒以外，再無可信任之人，恐使紛爭之象，更為加劇。三、黨內幹部對大人不滿之傾向，似日漸滋長，此舉未必為彼等所接受。若勉強行之，必將引起更大之阻礙。四、兒過去在青年團之失敗，固因環境之惡劣有以使然，但兒之不善於黨派之鬥爭，以及人事之應付，亦為失敗原因之一，此乃兒不得不自反者也。基於各項原因，黨的工作如再次失敗，則兒將不復再有抬頭之機會。即 大人有栽植之心，恐亦未必有可能者。<sup>27</sup>

蔣經國的家書透露兩點心理狀態：第一，如果接任斯職，此後恐將招致黨內外諸如“家天下”的指摘與疑慮；第二，他仍然對以往執掌三青团組織工作所遭遇的人事迫擠經驗耿耿於懷，推而及之，亦無把握能在陌生的黨機器內，善盡組織工作。函末，蔣經國替蔣介石預擬四個黨政部門的人事建議名單，其中，中央組織部長一職，蔣經國推薦他的留俄同學谷正綱。<sup>28</sup>蔣介石真的找來了谷正綱，不過，谷還是和去年一樣，堅拒這項任命。去年，陳立夫請辭，谷正綱曾以個人難能因應各方等理由，力辭蔣介石的委命，並且轉薦副部長余井塘扶正，惟陳立夫部長一職終未異動。本年陳立夫再度請辭，蔣經國、谷正綱先後拒絕了蔣介石的政治委託；據傳剛剛卸下參謀總長職務的陳誠一度也是蔣介石的考慮人選，然亦無疾而終；接着，余井塘同樣婉拒了蔣的委命。出於迴旋緩衝的考量，蔣介石繼而面示余井塘代理部長職務，余再以宿疾急待治療為由堅拒，為明心志，余一併請辭副部長一職。<sup>29</sup>

陳立夫請辭中央組織部長兩個多月以後，蔣介石才找來另外一位副部長谷正鼎代理陳立夫留下的位子。<sup>30</sup>這段期間正逢中國憲政體制開展之際，國民大會、立法院內的國民黨籍代表先後為了副總統選舉、立法院副院長選舉，以及行政院長同意權等人事問題，迭生派系風潮。眾多黨籍代表競相祭出“民主”護符，各伸己意，黨機器束手無策，即使是總裁蔣介石也無從節制，唯有徒負負。陳立夫既因黨籍國代之反動而坐失中央組織部長，該職位比附於燙手山芋，差堪不遠，這可能才是組織部長人選陷入難產局面長達兩個多月的主要原因。

### (四)

1948年，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政治脫序不再祇是多場幽冥不彰的內幕情節，而是大

量曝陳在公眾面前的鮮活事實；政權成員也因內戰節節失利而鬱積着失敗主義的情緒。春天，美國空軍測量隊開始執行台灣和華南沿岸的空中測量任務，美國記者報導蔣介石可能將政府遷至台灣。<sup>31</sup>6月下旬，蔣經國則向蔣介石“忍痛直呈”：“多數人之心皆惶惶然，而不知如何是好，我政府確已面臨空前之危機，且有崩潰之可能。”至是建請“在無形中從速密籌有關南遷之計畫與準備”，“今後萬一遭受失敗，則非台灣似不得以立足”。<sup>32</sup>11月，兩蔣談論黨務改造，曾有“非捨棄現有基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重起爐，加以根本改造不為功。至現局之成敗，可不以為意耳”之說。<sup>33</sup>所謂“另選單純環境”，雖未指明具體地點，但是遠離兵燹之地殆可確定。同一時間，黨政軍各部門業已展開先期疏散工作，台灣係一重點目的地。

這時，政權內外催請蔣介石下野的聲浪已經形成相當程度的聲勢。<sup>34</sup>12月，蔣介石伸張個人意志，授意相關部門任命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不過陳誠一度觀望不前，蔣經國則始終未就，箇中原因尚不明朗。<sup>35</sup>除非“這個反常現象也是要讓中共摸不清蔣介石的意圖”等說能夠成立，否則人們似乎應該另闢方向，探掘原始檔案，追索原委。<sup>36</sup>無論如何，人們透過蔣經國家書已可知道，蔣介石幾年以來非常清楚他的長子對於陳誠多有抱怨、齟齬不絕，但蔣介石個人事業飄搖之際，還是藉着人事派令，給兩人再次劃定了重疊的權力場（就地理而言），某種角度說，也分別授予代理台灣的重責。<sup>37</sup>蔣經國對於任命的反應未見於任何一封家書，但未就省黨部主委一事畢竟顯示：他仍然繼續選擇暫時地隱遁於公眾視野的背後。與此對應的鮮明場景則是：陳誠在1949年1月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後，又在春天兼充了蔣經國遲未視事的省黨部主委一職，實際上已成為台灣一地最難忽視的方面人物。這時，蔣介石個人與國民黨政權先後流離，蔣經國對於陳誠治理台灣的前景一直未表樂觀，而蔣介石倒是一度探詢他的長子出任台省民政廳長的意願。先是3月，蔣經國在溪口隨侍之時，已有“陳在台灣恐亦不能持久”之語；<sup>38</sup>6月8日，隨父親抵台（高雄）甫逾二週，修書婉言“出任民政廳長則不如擔任市長工作”，並且進一步建言“撤陳”：

台灣之情況，從各方面深加觀察，危機四伏，如不早日改道，則將來可能發生變亂，以至不可收拾。辭修先生恐難負治理台省之重任，俞大維先生實為主持台省行政之適宜人選。<sup>39</sup>

此時蔣經國以俞代陳的建議，是否和蔣介石一度對陳有所“焦慮”的態度有關，值得進一步觀察。先是本年春間，共軍渡過長江，蔣介石辭別溪口後，陳誠多次電促蔣介石早日赴台，敦請長期駐節，指揮各方，並且建議“黨政領導亟應建立戰時體制”。5月14日，蔣介石對於赴台一事給予肯定但未明示日期的答覆，不過就在三天後，蔣介石一行人即自舟山島定海機場飛抵澎湖馬公。蔣介石原有意在澎湖建設幹部訓練基地，然地形、氣候均不相宜，遂欲直赴台灣。這時，台灣、澎湖之間，電話電報一度不通，陳誠前往廣州參加財政糧食會議，多日未返，滯留澎湖的蔣介石心緒憂慮，頗為不定。在

陳誠結束赴穗任務直飛馬公謁蔣之後，蔣“數日來所焦慮者，至此釋然”。根據蔣介石自記，數日以來的個人焦慮在於“行政院在廣州召集財政糧食會議，陳辭修不問利害與結果如何，貿然前往參加，如果李宗仁、白崇禧等要求其運出台灣存金，而彼因應不宜，則其禍難測，甚為其危”。不過，像吳國楨這些政治圈高層人士的說法則是暗示，陳誠未能立即電復歡迎蔣介石赴台，這讓蔣介石心生疑忌，因此，25日，蔣介石一行飛抵高雄岡山機場（而非台北），暫時落腳壽山。<sup>40</sup>

無論如何，蔣經國並未說明何以陳誠難負重任，“以俞代陳”的建議也沒有獲得蔣介石採納，半年後陳誠卸下“治理台省之重任”更與蔣經國斯言無涉。不過，這封信幾乎已是國民黨台灣時期最早反映兩蔣與陳誠關係的一手線索。事實上，通觀家書全篇，這還是蔣經國年來屢次領受父命擘劃幹部組訓事宜的應卯之作。前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曾經告訴蔣經國：“外行的生意決不可以做，就是內行的生意，倘使沒有實權，亦不可以做。”5月，蔣經國以“人生似雲水”自況父子相依之情、海天漂泊之景，想起前幾年從事組訓工作，念及俞鴻鈞之言，“深感這幾句話，太深刻而有意義了。其實不但做生意如此，即做事亦何嘗不是如此”。當月，即以“五月反省錄”為題，誌感曰：

以自己的性情與能力來說，實在不適宜做組訓工作。數年來在這方面的努力，不得不承認是失敗的。今後倘使再要來做這一類的工作，徒增內心之痛苦而已耳。<sup>41</sup>

對蔣經國而言，組訓工作“徒增內心之痛苦”多有前例可徵，彷彿將之視為政途多舛因素的淵藪。不過，蔣經國仍然希望：“事無大小，但願有一具體之工作單位，能獨自爭氣而善為之。否則，願日夜奉侍 父親，以盡為人子者之孝道，其心亦得安矣。”<sup>42</sup>6月8日，蔣經國、陶希聖等人遞交蔣介石一份“幹部政策與訓練要旨”報告，蔣經國另以家書（與“以俞代陳”意見同紙）陳述對於幹部組訓事宜的基本想法，認為：“目前從事於新組織，如不脫離本黨之組織形態，恐難以形成。而吾人在此時是否有根本拋棄舊組織之決心，此實為組織之先決條件，蓋一般青年對於本黨已完全失望矣。”<sup>43</sup>函中，蔣經國同時建議重組國民黨黨體制下的特務組織，並婉轉表達了有志於此的願望：

今日人心日非，如何控制幹部之思想與行動，以防背叛，以及防止社會與軍隊之變亂，實為目前之急務，故必須加強特工組織，使其能發揮力量。擬將軍統與中統兩局，合組一非常行動委員會，謹將該方案附呈 大人核示。……關於兒之工作志願，已略述於“五月反省錄”內，大人認為可以負責非常行動工作，則願為之……。<sup>44</sup>

揆諸前後文意，蔣經國所憂慮的幹部“背叛”，以及社會、軍隊“變亂”，應該就是前述撤陳意見所指的“危機四伏”。8月，此一“非常行動”的組織合併了軍統、中統兩局，

於台北圓山正式成立，唯名稱代以“政治行動委員會”。<sup>45</sup>蔣經國是催生、規劃這個委員會的重要推手，此後也等於實際控制了這個組織，統管全台情治工作。以時間序列和實際影響面而言，蔣經國到台灣後最先開關，也是爾後最可立足的權力場，應當就是向蔣介石直接負責的國家安全事務。及至 1950 年春天，蔣經國就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負責政工改制工作，曲折觀之，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國安事務。1950 年，蔣經國逐漸返回了政治的前舞台，甚至是公眾的一般視野當中，3 月書告父親“自知本身之處境，決將自謙而待人，自尊而處事”。<sup>46</sup>這年夏天，以“陳家（立夫）黨”做為指述概念的國民黨組織人事基盤正式崩解，蔣經國獲蔣介石指定為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自此進入黨務決策核心。在這以後，透過國民黨宗派秩序的重組，以及複雜的人事掉鬮，甚至，“大人有栽植之心”的愈趨明朗化，蔣經國逐漸累積他在中國大陸時期尚未企及的權力高度，並在其政治上升之路上，交叉建構起一個人子與人臣的實質影響力，以及同想像中的政治競爭者進行政治競合的政治資本。

### 三、險中圖存：黨勢凌夷下的秘密組織

自從 1894 年開始，孫中山領導的政治團體，無論是訴諸武力性質的革命組織，或是依循民主政治常規而組建的議會路線政黨，始終在內部成員結構上，具有濃厚的集團塊分傳統。塊分傳統的產生，一者是因為黨史各階段習見的擴大隊伍、兼容並蓄的結盟作為，造成了黨的人事基礎形同雜燴拼盤的結果，一者則係黨的內部成員基於意識、利益的個別差異，導致尋求組織體系慣有的結派行為。<sup>47</sup>1924 年改組後的國民黨，繼續承接了黨史的集團塊分傳統。雖然自 1929 年開始，國民黨的總章總是明白張懸着針對“小組織”（派系具象化的代名詞）的禁制條款，黨中央並且在形式上再三申令禁絕，不過這些規訓從未改變黨內派系林立的事實。<sup>48</sup>對此現象，所能提供的一個解釋是：關於“小組織”禁制條款的起源，本身就是訓政初期南京中央與反蔣勢力鬥爭下的政治產物，亦即禁制條款是作為南京中央扼抑諸如改組派這類反蔣勢力的工具而出現的。即令條款本身含有高遠的理想，然而驗諸其後派系消長史實可知，任何小組織的正當性，端視山頭人物的地位強弱與政治的客觀環境而決定，絕不以禁制條款之三令五申為轉移。<sup>49</sup>

#### （一）

寢至戰後，國民黨面對中共的強力挑戰，“以建民國”的統治事業陷入深沉的危機，“保黨救亡”彷彿成了燃眉之急。人們各以目標分歧，但卻符合一己利益的改革芻議，力促蔣介石挺身實現每個人心目中的理想藍圖。一些國民黨上層菁英則認為，國民革命前景與其出於大鍋湯的雜燴方式，還不如將希望寄託在願意獻身革命志業，並且矢志效

忠領袖的少數人身上，因此陸續請求蔣介石同意（或由蔣介石主動交議）籌組某些構想中的“秘密組織”。<sup>50</sup>蔣介石熟知秘密組織在他以往幾次低宕的政治危機當中所曾起過的作用，包括：傳言中，蔣在 1927 年第一次被迫下野時，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建立的中央俱樂部；1931 年二次下野後，黃埔學生籌組的復興社體系，與二陳兄弟的青白團體系等。1947 年 5 6 月間，蔣介石在沉重的軍事壓力，以及後方校園、社會失控的情況下，開始在每晚子夜過後，起床禱告約半小時，這位基督徒的一日禱告次數因而增至四次之多。<sup>51</sup>這時，蔣經國建議他心力交瘁的父親另闢蹊徑，換個角度思考國民黨的改革。

自贛南時期開始，蔣經國即對黨部人員“領導地方舊勢力”而“殊多牽制”的行為頗表感慨。<sup>52</sup>抗戰後期，蔣經國初涉重慶政界，就其觀察，函諫其父，指陳一般幹部“作官慾日增”、“憑藉以往功勳，驕奢淫逸，鬥爭勇氣隨以消磨”，以致“大人之意志無由貫徹，人民則有不見天日之慨”，彷彿替另一面的“重慶精神”下一註腳，當即建言改組中央黨部，“將目前數千人員之事務機構，變為簡單靈敏、由百數十人組成決策戰略戰略之首腦部”。<sup>53</sup>1947 年 2 月，蔣經國則建議蔣介石改組國民黨中央常會、各地黨部，“使黨內事實上存在之大小集團，各有參加之均等機會，而任何一方面均不能把持操縱，亦不懼怕其他方面把持操縱，以促進黨內的精誠團結”。<sup>54</sup>但是隨着國內情勢愈趨不利於南京，5 月，蔣經國寫給父親的一份〈挽回局勢之意見〉直指：

國民黨與青年團在一般人心已失去信仰，無論如何改造，不能發揮強大之力量。目前必須有新的秘密組織，以造成核心之力量。<sup>55</sup>

數年以來，蔣經國目睹國民黨國事業的積弊，以及親歷政治排擠的不快經驗，使他逐漸累積了這樣的一種看法：如果對照北伐、抗日的前期革命歷史，後期國民革命的障礙不祇來自共產黨的軍事挑戰，同時也在於國民黨內部的腐化勢力刻正逐漸擴大之中。蔣經國認為，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舉凡具有高度信仰意念、反擊能力的少數勢力便應該集結起來，成為一支撥亂反正的可靠力量。1947 年春天，蔣經國和鄭彥棻等人即在北平秘密成立一個標舉反貪污口號的小組織“燕廉”，成員包括一些平津黨政官員以及中學、大學教員，該組織並曾向蔣介石舉報官員貪污的具體事證。<sup>56</sup>大約同一期間，中央訓練團縣政訓練班主任何浩若則向兩名縣政班學員轉述後期革命的基本構想，要求為蔣經國草擬一份具有理論效果，又有具體程序的政治綱領。兩名學員從此待在南京孝陵衛的一個小房間內閉門苦思。入夏，一萬餘字的定稿送到了蔣經國的手上。根據其中一名執筆人的說法，這份定名為〈國民革命後期革命的理論與實際〉的檄書，抨擊了國民黨內部的腐敗現狀、軍隊紀律廢弛等弊端，文件並以未指名的方式，廣泛攻擊了國民黨政權內部所謂“政閥”、“軍閥”、“財閥”、“文閥”各方勢力。<sup>57</sup>這份文件可能為蔣經國的政治牢騷起了理論化的若干效果。例如 7 月間，蔣經國在浙江嘉興對青年軍復員學生進行思想整訓的夏令營上，公開提出了極具聳動效果的政治口號：“一次革命，兩面作戰”。

## (二)

“兩面作戰”的打擊對象，其實脫胎自 1927 年清黨時期南京方面希望擯退的所謂“惡化”、“腐化”勢力；<sup>58</sup> 口號的思辯基礎，系出蔣經國自蘇聯、贛南以來經常強調的：革命的成敗繫於“兩個對立力量的生死鬥爭”；至於其訴求內容，則顯然是蔣經國近來的政治牢騷加上追隨者添枝加葉，試圖為之理論化的綜合性產物。蔣經國認為，為了將後期國民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一次革命），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應該同時在兩個戰場上，致力剷除共黨的赤化、國民黨的腐化（兩面作戰）。這項論調經過蔣經國一再的闡發，以及透過各種途徑傳播，使得蔣經國的一些部屬與追隨者都相信，這就是蔣經國痛挽時弊的政治綱領，且多認為這個綱領一直貫徹於蔣經國以後的政治行動之中，例如在上海經濟管制時期採取的“打老虎”舉措。<sup>59</sup>

1948 年 4 月中旬的某個夜晚，南京勵志中學內的高二教室聚集大約三十至四十餘位立場親近蔣經國的青年幹部，這些人均由蔣經國預先挑選出席。蔣經國從鄰近的勵志社個人寓所徒步抵達教室，對着滿室的政治追隨者進行講話。語間，他再次敷陳了“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的論調。透過蔣經國的策動，與會幹部當場成立一個名為“鐵血救國團”的秘密組織，用作眾人實踐革命事業的組織基礎。秘密組織的名稱來自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著名的鐵血政策，李煥擔任書記。這些與會者壓低嗓音地就三民主義、蔣介石、組織各項，進行了具有效忠效果的宣誓儀式。勵志中學密會結束後一兩天內，蔣經國在勵志社寓所繼續成立了鐵血救國團的上層核心組織：“中正學社”。學社成員共計二十一名，泰半出自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的畢業者，俞季虞擔任書記。<sup>60</sup> 5 月 1 日，蔣經國以家書報告蔣介石：

各大學青年軍學生為加強本身之團結，並以行動對付共匪，最近發起一“鐵血救國團”之秘密組織，並有“中正學社”為核心。此組織對內對外皆絕對保守秘密，目前正在開始發展中。<sup>61</sup>

鐵血救國團作為中正學社的外圍組織，主要吸收對象是各地大學教師與青年軍復員學生，這就使得輿論所稱，副總統選舉過後，蔣經國、鄭彥棻等人認為非着手組織“黨的新力量”不可的相關報導，具有某些可信的意味。<sup>62</sup> 去年，蔣經國即以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身分，綜理復員青年軍的組訓和現役青年軍的政治工作，但仍招致國防部高層公開批評“青年軍為特殊幹部所領導之特殊部隊”、“預幹局乃為主席特設之機構”。本年初，蔣經國以部內人事齟齬問題為由，“更不願使 大人因兒之事，而背後遭人之譏謗”，力請辭職，實即與參謀總長陳誠再次摩擦導致。賈亦斌代理了預幹局局長職位，不過蔣經國對於青年軍的實質影響力並未稍減。<sup>63</sup> 各省市學校凡有青年軍復員學生者，均成立復員青年軍聯誼會，從事校園政治、學運偵測工作。<sup>64</sup> 本年夏天，一些經評估為思想可靠的青年軍復員學生，參加了幾個城市的夏令會活動。營期終了，鐵血救國團從中

秘密吸收了若干活動力強的學員入團。

夏令會的編制費用由預幹局報請蔣介石核准，各營籌備人選則由中正學社派定。以 7 月份杭州營為例，籌備人即是來杭主導成立當地鐵血救國團的兩名中正學社社員：江國棟、王昇。<sup>65</sup> 毫不為奇的，夏令會完全成為註解蔣經國政治立場的陣地。例如杭州夏令會會方曾經發表聲明，宣稱要以“一次革命，兩面作戰”作為行動的最高指針，主張掃除橫陳在民生主義之前的兩大障礙，即所謂“殘暴的共匪與腐敗的官僚”。聲明並強調，國民黨和政府本身的腐化，才是給予共黨可趁之機的罪魁禍首，所以“我們在【不】想徹底剷滅共匪則已，否則必須打倒官僚，剷除豪門，肅清貪污”。<sup>66</sup> 一名宣稱“一次革命，兩面作戰”才是“中國自新的唯一出路”的學員，經過一番意氣激昂的文字痛陳之後，乾脆一一點名國民黨對內革命應該打倒的對象：政學系、CC 系，以及“孔宋張何等豪門資本”、“貪官污吏”。一位將整肅人事視為當務之急的學員則問道：“談革新，也得用重典，‘眾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總不致有何冤屈吧？”<sup>67</sup>

## (三)

從國民黨政治菁英的總體動態考察，蔣經國的秘密組織祇不過是 1948 年黨內“次級團體化”現象加劇的一個例證而已。在立法院內，以派系搏合而成的各種政治俱樂部令人目不暇給。在立法院外，若干國民黨高層幹部也嘗試籌組、重建秘密小組。除蔣經國外，諸如：熊式輝整合政學系勢力，意欲成立“篤力社”；內政部長張厲生打算重建抗戰前活躍於華北的“誠社”勢力；安徽團方重鎮，親陳誠的張宗良則運用行政及團方資源，組織“中國青年團”；黃埔系、復興社勢力更是渴望恢復他們在 1930 年代最高層級的政治秘密組織“力行社”。<sup>68</sup>

1948 年，另一個信仰小組組織力量的國民黨政治人物是陳誠。關於陳誠在軍政圈內自樹秘密小組的蜚言流語始終不斷，傳聞中的組織或者稱為“陳社”，或者名之“干城社”。同年 4 月，部分國民大會代表要求清算陳誠在東北戰事以及參謀總長任內指揮無功的責任，甚至以“揮淚斬馬謖”相期於蔣介石；同時，國大會場流傳多種反陳傳單，其中包括控訴陳誠與干城社，籲請“肅清國軍敗類”的憤激語。鑒於外在的政治壓力和陳誠長期胃疾纏身的因素，國民政府於 5 月份解除陳誠的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主任二職。<sup>69</sup> 政治生涯遭逢重挫的陳誠，透過與黃杰的一次私人晤談，期待麾下幹部及幹部影響範圍內的人事勢力，仍當以“父兄”看待蔣介石。接着，陳誠針對拉他下台的幕後政治因素，表露了不滿，並且向黃杰提示派系組織的適應之道：

現在我是垮台了，封建勢力像政學系、桂系、民社黨、青年黨等等，他們結成了一個政治集團，打擊我、打擊 C.C. 派，並將以全力打擊胡宗南，將來也會 [有] 打擊到你們頭上來的一天。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國民大會之後，封建勢力

抬頭。別人都有組織，都在大肆活動，而我們反趨於渙散，趨於分崩離析，這是自取滅亡的現象。有許多同志生活非常艱苦，你們有機構的人，不去幫助他們，這是你們不團結，不互助。我希望召集各省的優秀幹部到南京開一次會，澈底的檢討關於我們的組織問題。<sup>70</sup>

黃杰留下的這段談話，證實陳誠確實擁有個人小組織，同時也間接敘明了國民黨小組織哲學裏面難以言說的一種幽微意識：如果不像別人一樣以小組織整合、伸張政治勢力，那麼就等於自招滅亡。進一步說，上述國民黨人的小組織行動，概多起於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扯引出黨人各行己是的政潮之際，從某種角度而言，即為黨權統制能力鬆動的連帶產物。不過，參與張宗良小組織的一位僚屬倒是揣測，張宗良的小組織出於南京方面的發動。這名安徽省建設廳官員在多年後的憶述文字裏，針對蔣介石、陳誠、黃復青勢力三方面授意張宗良籌設組織的可能性，進行了想像性的分析。<sup>71</sup>陳誠、黃復青勢力對於秘密組織的基本態度前已述及；事實上，蔣介石每逢政治事業困蹙，必有傷嘆之語，認為實係欠缺“幹部”、“組織”輔翼之。所謂“組織”，自然非關黨機器。<sup>72</sup>1948年春天，蔣介石在一次官邸訓練會報當中，就宣講了他慣有的、以少搏大的菁英領導哲學，意在期待少數忠實幹部作為國民革命的中流砥柱，進而發揮影響力，翻轉劣勢：

要發揮革命精神，我不要你們像過去的一般按步【部】就班的做了。現在大家應明瞭我的意思，……在這個時候，一般黨員和機關是負不起這一時期的重任的，全賴少數的幹部，實實在在的研究，實實在在的力行。現在一般人都侈言政治改命【革】，改革之道，完全繫於少數幹部負起責任來做，忠貞不移，篤實力行，一年半載，即能發生力量。民國廿一年時，力行社沒有幾個人，工作成績很好，一個人發生十個人的力量。精神上的影響是無形的，足以振奮人心，社會為之恐懼。革命就是這個作法，而按步【部】就班是不行的。<sup>73</sup>

這場即席訓示裏，蔣介石勗勉在場幹部，學習 1930 年代的力行社，採取果斷的行動別開蹊徑，“我堅定的指示大家，今天成功的機會到了，大局的轉移，在於一、二人心之所嚮，祇要你們肯負責，天天下決心去幹，少數人決可影響整個的局勢”，他結論說道。<sup>74</sup>

在中國刻正開展步履蹣跚的憲政事業之際，蔣介石卻是開始緬懷當年具有特務色彩的政治秘密團體，實即難掩意志集中、革命動員的救亡心態。事實上，國民黨內部小組織的運作哲學，形式上訴諸拯救“黨國”，實質上則是恆以一種封閉式的人事組合姿態，爭取並維護自己與同僚的政治利益。在想像中，“黨國”愈為艱危，那麼在現實中，小組織現象愈為熾烈。不過，包括蔣經國及其翼下組織在內，祇要這些小組織保證他們對於領袖（蔣介石）的服從，那麼作為最高仲裁者的蔣介石就有理由相信，各家小組織收割的政治利益終將匯集到自己的手上。同時，由於“領袖”和“黨國”二詞，在國民黨正統陣營幾乎具有字義互訓的效果，因此，作為最高領袖的蔣介石似乎更有理由說服自己：

自我匯收到的政治利益終必也是“黨國”的最高利益。職是之故，蔣介石在 1948 年夏天，幾乎複製了 1927 以及 1931、1932 年的經驗，在其領導威權日見傾圮之際，繼續迷信他的小組織哲學。

#### 四、結語：蔣介石・蔣經國・宗派主義

從蔣經國戰後家書中，我們看到一位人子透過私密的書寫，向他的父親陳述政治上升之路路上的人事障礙因素，實則宗派主義橫梗其中使然。在宗派主義籠罩一切的情況下，蔣經國自贛南時期即難以避免地捲入如他所稱“殊多牽制”、“造謠生事，不遺餘力”的人事漩渦中。<sup>75</sup>及至抗戰後期，蔣經國承領父命，轉移工作重心至重慶，此後數年，直到戰後還都南京，這位新人的主要職位都是繫於三青团中央、青年軍政治工作等具有全國能見度的政治事務上，短兵相接，和國民黨上層菁英之間的競合行為勢必催化至白熱化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兼具的人臣身分，係由蔣介石直接派定；超乎我們所知的，戰後的蔣介石甚至願將黨機器（組織部門）託付其子。不過，根據家書所呈現的線索，蔣經國與既有菁英基於分食權力大餅而產生的緊張關係，不僅沒有因為其特殊血胤之身分而有緩解之可能，基本上，反而累次激化，甚至導致性格敏感的蔣經國暫時撤離權力場。直到 1950 年，國民黨在台灣“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宗派秩序在島上進行重組的關鍵年代，蔣經國才算真正回到公眾視野，從而逐漸在其政治上升之路，交叉建構一個人子與人臣的實質影響力。

從這個角度看，蔣介石——陳誠——蔣經國的關係也就格外令人玩味。學界常以蔣介石身後權力繼承的角度，思考 1949 年之後陳誠、蔣經國在台灣競合關係。某種程度上，兩人弛張相隨的狀態其實早已出現在國民黨中國時期：他們的活動領域不僅有所交疊，且交疊之處均由蔣介石親自劃定，實際看來，兩人則有未盡磨合之感，蔣經國也常以“失敗”之身，再三“呈明”其父，“以供參考”。<sup>76</sup>似乎部分地基於這種不盡愉快的經驗，蔣經國甚至不惜進言“撤陳”。然而，蔣介石始終在“股肱（陳誠）”與“骨肉”的兩造之間，謹慎維持着槓桿的平衡。對此現象，人們或許可以根據不同的角度衍為不同的解釋，其中，蔣介石個人領導風格裏的現實取徑可能也是一個值得思索的方向。國民黨中國時期，宗派主義愈趨於負面的激盪，愈對於政權的內部穩定以及外在觀感，造成難以言喻的傷害。但祇要這些代理國民黨黨國事業的勢力不吝表達對於“領袖”與“黨國”兩個互訓辭彙的最高忠誠，那麼在盡可能的相對限度內，宗派作為政治體系裏的一種必要之惡，卻也總是能夠被互為需要的蔣介石容忍着。1950 年之前，蔣經國親歷的人事迫擠經驗，未能過多地撼動他父親的現實思考路徑，人子家書最為私密的申訴往往未見得奏功；1950 年後，儘管蔣介石反覆申說宗派主義的罪愆，但實際上，宗派代理黨國

的舊有架構也不過是透過這位總裁的重新盤整而產生新階段的變化罷了，准此以觀，做為人臣的蔣經國仍然要親身投入賽局，不可能奢望父親為他全盤廓清。

國民黨內的小組織競起現象亦可作如是觀。1945年六全大會之前，蔣經國曾向蔣介石痛陳“小組織、小圈子無所而不使青年（對國民黨）退避三舍、望而生畏”，這是這位政治新人戰時挖掘黨務沉痾總體相的重要結論之一。<sup>77</sup>但是就像本文所展示的情節那樣，蔣經國本身也是宦海的弄潮兒，不斷行動，而非徒務言說，翼下秘密組織所欲爭取、動員的對象，恰恰也正是那些如他所說，可能會因為“小組織、小圈子”而對國民黨“退避三舍、望而生畏”的“青年”。在戰後國民黨政權氣勢日漸凌夷之際，蔣介石、蔣經國以及不少的國民黨政治菁英共同喚醒了如下的救亡內在邏輯：一切的小組織，或組織小組織的念頭、作為，都因為“擁戴領袖”而有了存在的合理性，也都因為“拯救黨國”而有了存在的必要性。黨機器於實際環境不再能節制各方，於理念層次尤其無從撼動人心，在黨務改造似乎託諸命運未知的將來之際，統治菁英當下基於現實取徑的思考，動輒形諸一種封閉、內向的姿態，往自己最可信賴的私人關係網絡裏頭動員下去，這是蔣經國等人的脫困之道，換言之，他們實際上是拿宗派主義救己救黨了。

#### 注釋：

1. 江南，《蔣經國傳》（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頁137－154，169－193；小谷豪治郎，《蔣經國傳：現代中國八十年的證言》（東京：プレジデント社，1990），頁129－184；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文化，2000），頁140－179；李松林、陳太先，《蔣經國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2），頁221－254；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頁106－188。
2. 蔣經國，《五百零四小時》，1954年發表；〈滬濱日記〉，1955年發表。共同收入：蔣經國，《點滴在心頭》（台北：黎明文化，1978）；蔣經國，《五百零四小時》（台北：正中書局，1988）。
3. 檔案最後一冊（即第五冊）則是1949全年寫給海外的宋美齡的家書，歷次發信地點自溪口一路輾轉至台北，內容多半係報告蔣介石下野後的最新行止。
4. 第75次會議，1938年4月28日，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台北：未載彙印年份），頁203。
5. 1946年10月，三青團重行調整中央幹事會的機構與人事，原組織處與訓練處取消，職權劃歸新設的第二處。
6. 〈蔣經國函蔣中正夏令營如完成訓練計畫定能收良好效果〉，1947年7月26日，嘉興，毛筆函件，《蔣中正總統檔案•領袖家書•蔣經國先生家書》（以下簡稱《蔣經國家書》），第3冊，編號：0496－0500，國史館藏；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9），頁172，181。
7. 參見：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171－183。
8. 〈蔣經國函蔣中正陳述對於青年團之領導觀念〉，1947年1月21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3冊，編號：0319－0330。
9. 參見：王良卿，〈“新人”與“起家”——蔣經國先生的崛起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20輯（台北：1999），頁339－392。
10. “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1946年8月9日條，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台北：國史館，2005），頁193。
11.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349－350。

12. 〈蔣經國函蔣中正帶陳告幹校同學書等〉，1947年3月15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3冊，編號：0368－0379。
13. 〈蔣經國函蔣中正遵命已向教育部辭職〉，1947年4月23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3冊，編號：0395－0399。
14. 1945年9月，蔣經國曾獲任命為組織部組織委員會委員。但和其他六名委員相較，蔣經國欠缺黨的中央執行委員身分以資屏障。實際上，此會在整個黨務組織體制中，亦無積極作為。
15. 〈蔣經國函蔣中正夏令營如完成訓練計畫定能收良好效果〉，1947年7月26日。
16.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ug. 19, 1947, in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 – 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 131. 陳立夫暫留原位的原因，至少和蔣介石又考慮到1947年底各項行憲選舉日益迫近，需要陳代為操作、動員有關。另，陳立夫此次面臨的政治危機是否和4月份的政大教育長任命風波有關，頗堪注意，但筆者尚未發現可靠的一手資料足供證明。
17. 《事略稿本》，1947年9月5日條，《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18. 周君羊，〈黨團統一經緯〉，《新聞天地》，第28期（上海：1947年10月1日），頁2；南京《新中華日報》，1947年8月10日，9月7日。
19. 〈蔣經國函蔣中正懇請不派擔任黨部中有名義之工作〉，1947年9月12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3冊，編號：0532－0537。
20. 《事略稿本》，1947年9月15日條。
21. 〈蔣經國函蔣中正李之當選實為最大恥辱呈述意見報告數項〉，1948年5月1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4冊，編號：0638－0642。
22. 詳見：李新總編，朱宗震、陶文鈞著，《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51－56；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371－373。
23. 《事略稿本》，1948年5月1日條。
24. 〈蔣經國函蔣中正李之當選實為最大恥辱呈述意見報告數項〉，1948年5月1日；《事略稿本》，1948年5月2日條。
25. 〈陳立夫呈蔣中正准辭組織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48年5月1日，毛筆原件，《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41冊，目次號：23，《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並見《事略稿本》，1948年5月2日條。
26. 宗仁陣營與“行新政，用新人”口號，參見：南京《新民報》，1948年4月29日；張垣《民生報》，1948年5月29日。“行新政，用新人”一句，在國民黨政圈裏早已流傳有時；朱振聲編纂，黃晃校勘，《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1冊（香港：李氏家屬自印，1975），1939年3月11日條，頁245。不過，在1948年春天，該句主要是以李宗仁的競選口號名噪一時。
27. 〈蔣經國函蔣中正擔任組織部長一節不能不作以下之考慮〉，1948年5月4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4冊，編號：0643－0647。
28. 蔣經國建言改組黨政人事：“一、中央黨部秘書長由張厲生先生擔任。二、組織部長由谷正綱先生擔任。三、內政部長如無適當人選，似可由唐縱同志擔任。四、社會部長由鄭彥棻同志擔任，並透過社會部以形成新的力量。”〈蔣經國函蔣中正擔任組織部長一節不能不作以下之考慮〉，1948年5月4日。
29. 谷正綱事：香港《華商報》，1948年5月9日。陳誠事，由鄭介民透露，秦德純轉述：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9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48年5月31日條，頁72。余井塘事，見《事略稿本》-1948年6月6日條；張叔明，〈永留懷思的哲人風範〉，大華晚報社編，《余井塘先生紀念文集》（台北：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1985），頁132－133。
30. 7月15日，中常會通過蔣介石交議的谷正鼎代理案。1949年1月真除。第157，176次會議，1948年7月15日，1949年1月24日，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台北：1954），頁714，765。至於陳立夫辭去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職務，在陳立夫提出辭呈一個月後，確定由陳布雷代理。
31. 香港《華商報》，1948年3月19日。
32. 〈蔣經國函蔣中正望從速密籌南遷之計畫與準備〉，1948年6月26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4冊，編號：0670－0674。
33. 《事略稿本》，1948年11月24日條。
34. 合眾社、法新社、路透社等電文，香港《華商報》，1948年10月22，24，28，31日；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9冊，1948年11月3，6日條，頁150，152；《事略稿本》，1948年11月19日條。
35. 陳誠一度觀望：〈蔣介石電陳誠何日就職立復〉，1949年1月2日，毛筆抄件，《蔣經國總統檔案•忠勤檔案•蔣中正手令錄底》，卷號：3，手令錄底第1冊，目次號：1，國史館藏。
36. 摸不清意圖：陶涵語。《台灣現代化的推手》，頁181。另，陳誠曾提出不完全解釋：他被發表為省主席，

事前並未獲得徵詢，事後仍認為原主席魏道明可留原位，自己則“在軍事上以個人關係”協助之。薛月順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台北：國史館，2005），頁6－7。

- 蔣經國與陳誠關係的又一例，及其家書反映內容，並見本文第三節（二）辭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一事。
- 〈蔣經國電宋美齡李已正式提何為行政院長〉，1949年3月13日，溪口，毛筆電稿，《蔣經國家書》，第5冊，編號：0771。
- 〈蔣經國函蔣中正陳述組訓幹部工作意見〉，1949年6月8日，高雄，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4冊，編號：0735－0742。
- 《事略稿本》，1949年4月29日，5月14日，5月17日至6月24日條；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台北：正中書局，1988），1949年5月17日至6月24日條，頁81－94；陶希聖，《三十八年中二三事》，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3月12日；陶希聖，《八十自序》（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1978），頁47；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261－263；陶希聖口述，陳存恭、蘇啓明、劉妮玲訪問，陳存恭、尹文泉總整理，《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頁262；“蔣公侍從人員史”編纂小組編纂，《蔣公侍從見聞錄“侍從人員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頁211；裴斐（Nathaniel Peffer），章慕庭（Martin Wilbur）訪問整理，吳修垣譯，高雲鵬譯審，馬軍校注，《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82－83。
- 〈五月反省錄〉，1949年5月，毛筆件，《蔣經國家書》，第4冊，編號：0730－0734。蔣經國從父游普陀山，見某寺有堂名曰“雲水”，遂以自況父子相依、海上漂泊。
- 〈五月反省錄〉，1949年5月。
- 〈蔣經國函蔣中正陳述組訓幹部工作意見〉，1949年6月8日。參見《事略稿本》，1949年6月9日條。
- 〈蔣經國函蔣中正陳述組訓幹部工作意見〉，1949年6月8日。
-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248－249；陶涵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頁207；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頁221。
- 〈蔣經國函蔣中正已自昨日起在政治部工作〉，1950年3月26日，台北，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4冊，編號：0743－0744。
- 筆者在這裏以“塊分”一詞取代“分裂”。一般而言，後者具有負面的價值色彩，同時也不能適當說明政治操作過程裏可能出現的派系合作行為。
- 黨員不得自樹組織的禁制條款起源始於1928年2月二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整飭黨紀之方法案》：“凡屬黨員，非經中央黨部之許可，無論黨內黨外，不得自行組織或加入其他政治團體。” 榮孟源主編，孫彩霞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頁522；參見陳公博，《今後的國民黨》，1928年5月13日，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63。1929年三大大會修正總章之時，正式將“小組織”的禁制條款納入黨的最高章程。詳見三大大會所修正總章第十一章第八十條第六項，臨大大會所修正總章第十二章第八十二條第六項，六大大會所修正總章第十三章第七十五條第六項。蔣嘯青編述，《中國國民黨黨章沿革概述》（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8），頁73，108，144－145。1938年，五屆四中全會通過〈黨內不許樹立派別與任何小組織案〉，黨中央與蔣介石多次申令各級黨部與全體黨員格遵決議；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39－40，77；蔣中正，〈黨員任務及革命力行之要道〉，1939年1月30日五屆五中全會閉會講詞，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6（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50；〈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為消除黨內派別和小組織事致各級黨部與黨員書〉，1940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檔案》，717(4) /221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 1935年底，邵元沖宣誓就任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誓詞有絕對無小組織等語，邵於當天日記說道：“是否能實行，則在各人之良知自省耳。” 足堪玩味的是，邵在此處着重的是“良知自省”，並未提及黨紀的懲治功能。邵元沖著，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沖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35年12月2日條，頁1340。
- 例如：“鄧文儀簽呈”，1947年6月2日，《特交檔案》，光碟編號：08A-02203，002－080115-013－011，《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事略稿本》，1947年6月2日條。
- 蔣介石的子夜禱告行為，至少持續至這年年底或更久，根據蔣日記所稱：“無一夕間斷”。《事略稿本》，1947年12月31日條。
- 〈蔣經國函蔣中正有人造謠攻訐當謹慎防範〉，1939年11月18日，贛縣，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1冊，編號：0072－0077。
- 〈蔣經國函蔣中正徹底改組本黨〉，1945年2月25日，復興關，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2冊，編號：0291－0307。
- “目前黨團問題之癥結及其解決原則與步驟”，〈蔣經國函蔣中正陳述返京後工作〉，1947年2月17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3冊，編號：0335－0355。
- “挽回局勢之意見”，〈蔣經國函蔣中正有關時局之材料〉，1947年5月27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

家書》，第3冊，編號：0419－0438。

- 劉謫章，〈憶蔣經國在華北的“反貪污運動”〉，《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42輯（北京：1980年12月），頁211－215；屈凌漢，〈蔣經國的小組織“燕廉”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42輯，頁216－222。
- 業衍璋，〈我所知道的中央訓練團縣政訓練班〉，《江蘇文史資料》，第24輯（南京：1988年12月），頁105－107。兩名訓練班學員是業衍璋、黃毓筠。
- 《清黨原則》，1927年5月5日通過，國史館審編處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二）——寧漢分裂與清黨》（台北：國史館，2002），頁301；〈中國國民黨清黨條例〉，1927年5月21日發表，與〈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宣言〉，1928年2月7日通過，均見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宣言集》（台北：編者印行，1976），頁183，191。
- 參見：王良卿，〈“新人”與“起家”——蔣經國先生的崛起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20輯，頁366，390。王良卿指出：“資料顯示，蔣經國的蘇聯經驗深刻的烙印在他的革命論當中。在蔣經國的思想言論當中，經常可以發現一些簡單的二元對立／鬥爭概念；這些素樸的二分法言論，通常被用來鼓舞人們的熱情，要求採取決然的革命行動，哲理性雖不足，渲染力則大有餘。” 蔣經國慣用二元對立的概念激揚人們的行動意志，但並不表示他刻意漠視事理的複雜結構。例如蔣經國對於“革命”一詞的解釋，便習慣出諸辯證法的表述方式。詳見王良卿，〈“新人”與“起家”〉，頁348－349。茅家琦認為“留蘇十二年正是蔣經國世界觀的形成時期”，他概括了這個時期對於蔣經國主要思想的影響：“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斯大林模式；托洛茨基觀點及民粹主義思想；辯證唯物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 茅家琦並指出蔣經國回國之後，贛南從政、上海打虎，都可以看出留蘇十二年的思想影響。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頁13－64；447。關於1947年的嘉興夏令營，以及蔣經國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論”：徐炳煊，〈我所知道的蔣經國的“幹校系”及其活動〉，《安徽文史資料》，第17輯（合肥：1983年12月），頁105－107；賈亦斌，《我與蔣經國從友好到決裂》，《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總第132輯（北京：1997年2月），頁146－149；陳桓，〈回憶在蔣經國小組織中的活動〉，《武漢文史資料》，總第32輯（武漢：1988年6月），頁72－73；方慶延，〈蔣經國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經過〉，《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南京：1982年5月），頁59－60。
- 〈蔣經國函蔣中正李之當選實為最大恥辱呈述意見報告數項〉，1948年5月1日；方慶延，〈蔣經國的秘密核心領導組織——中正學社〉，《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81輯（北京：1982），頁202－209；方慶延，〈蔣經國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經過〉，頁60－63；方慶延，〈一水天涯憶李煥〉，《武漢文史資料》，總第32輯（武漢：1988年6月），頁27－28；賈亦斌，《我與蔣經國從友好到決裂》，頁154－157。方慶延，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二期畢業，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中校代科長。賈亦斌，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代局長。關於鐵血救國團的名稱，一般憶述文獻大多記為“鐵血救國會”，本文權以國史館藏蔣經國家書所載為準。鐵血救國團的成立日期，方慶延一稱4月中旬，一稱5月中旬，賈亦斌則指為4月中旬，驗諸國史館藏〈蔣經國函〉，5月中旬之說顯然不確，今從4月中旬之說。勵志中學高二教召集會人數，方慶延稱四、五十人，賈亦斌稱三十餘人。關於中正學社成立日期，方慶延的兩種說法也略顯模糊。中正學社成員人數，方慶延指稱有二十一人，並列出名單：蔣經國、俞季虞、方慶延、江國棟、王昇、戴明鎮、蕭昌樂、周振武、蕭濤英、向長鴻、陳志競、陳富源、龍得志、方煥、徐富庠、許功銳、王志尊、劉星權、許正儒、雍萬里，及一農性成員。賈亦斌透露，蔣經國嗜讀《俾斯麥傳》；方慶延指出，王昇將中正學社比附為“希特勒的智囊團”。
- 〈蔣經國函蔣中正李之當選實為最大恥辱呈述意見報告數項〉，1948年5月1日。
- 陳桓，〈回憶在蔣經國小組織中的活動〉，頁74；方慶延，〈蔣經國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經過〉，頁62－63；新加坡《南僑日報》，1948年6月18日。
- 詳見〈蔣經國函蔣中正皎明堅辭預幹局長理由〉，1948年2月29日，南京，毛筆函件，《蔣經國家書》，第4冊，編號：0623－0627；賈亦斌，〈我與蔣經國從友好到決裂〉，頁141－145；徐炳煊，〈我所知道的蔣經國的“幹校系”及其活動〉，頁119。
- 覃異之，〈蔣經國與青年軍〉，《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28輯（北京：1980年12月），頁146－147；陳桓，〈回憶在蔣經國小組織中的活動〉，頁72－73；徐炳煊，〈我所知道的蔣經國的“幹校系”及其活動〉，頁103－107。
- 方慶延，〈蔣經國的“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經過〉，頁63；陳桓，〈回憶在蔣經國小組織中的活動〉，頁74。
- 〈我們的具體意見〉，杭州青年夏令會學員生活管理委員會出版夏令新聞社，《夏令新聞》，第2期（杭州：1948年7月30日）。
- 一樵，〈一次革命兩面作戰〉；俞鯤，〈再論本黨革新問題〉。均見《夏令新聞》，第2期。並參見同期各篇文章。
- 1948年10月，賦閒的熊式輝於南京、上海兩地籌議建立政學系具體組織。張羣、張嘉璈、魏道明、吳鼎昌、陳儀、沈鴻烈、何廉等誼屬政學系的黨政要人，各以程度不一的方式參與了組織的籌建過程。11月，熊式輝在上海主持“篤力社”的籌備大會，到會者約四十人左右，多係政學系中級骨幹，一些高層分子則派出代理人與會。籌備大會所通過的組織章程顯示，這將是一個封閉性的人事組合，例如新社員的入會，

需經相關會議的全票通過許可。關於組織取名“篤力”的原因，據說是要求社員“篤信力行”三民主義，事實上，蔣介石的確也時常以此相勉黨人。由於年底政府軍的全面崩潰，京滬風聲鶴唳，政府部門幾近癱瘓，這個組織最終沒有來得及正式成立。關於篤力社，詳見王又庸，〈關於“新政學系”〉，《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4輯（北京：1960年5月），頁81-83；馮若飛，〈我所知道的張羣〉，《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42輯（北京：1961年2月），頁201-202。1948年5月，四十餘名前誠社社員假內政部舉行聯誼會，當時尚在內政部長任內的張厲生致詞表示，戡亂救國人人有責，有志之士應齊心協力報效黨國。與會者就成立一政論雜誌社事宜進行討論，這將是一個聯絡各地誠社分子的具體組織。不過，隨著國家局勢的不變，張厲生的組織計畫也胎死腹中。關於誠社，與張厲生打算重建該社勢力一事，詳見梁尚德，〈我所記憶的“誠社”〉，《文史資料選輯》〔山東〕，第20輯（濟南：1985年9月），各處；特別是頁216-217；胡夢華，〈CC外圍組織誠社始末〉，《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14輯（北京：1981年2月），各處。又：張厲生原屬CC成員，此刻政治關係則已頗為親近陳誠。關於張宗良與中國青年團，源於1948年5月張宗良自南京國民大會返回安徽之際。9月，張宗良集合了二十多名前三青團幹部與省政府官員，在會中抨擊國民黨已然奄奄一息，主張建立“中國青年團”號召民眾，並發下入團登記表。同前面提到的政學系與張厲生等人一樣，張宗良的小組織企圖，也不敵瞬發即至的惡化時局，落空了。田世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合肥：1983年4月），頁12-15。1948年冬，黃復青勢力成立“業餘聯誼社”。該社幾次集會裏，多人主張有必要恢復力行社組織，其中，賀衷寒態度最為積極，認為應以秘密組織抗擊中共。不過何應欽、張治中不贊成此議。因為戰事緊迫的緣故，這個計畫也給擱置了。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台北：實踐出版社，1984），頁687-688。

69. 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126-132，296-303；《事略稿本》，1948年4月13日條；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8冊，1945年1月24日，1947年11月18日條，頁13，506；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1948年4月15-16日，5月13日條，頁316-317，360-361。關於陳誠下台事，參見：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246-249。
70. 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1948年5月10日條，頁354。陳誠將政治對手視為“封建”，並見：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131，300。
71. 田世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頁14-15。
72. 詳見《事略稿本》，1948年2月1日條；楊天石摘引蔣介石《日記類抄》1931年12月24日內文，楊天石，〈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讀蔣介石《日記類抄》〉，《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頁37。
73. 與會的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黃杰留下這段談話的記錄。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1948年3月23日條，頁284-285。
74. 黃杰，《中央軍官訓練團工作紀要》，1948年3月23日條，頁286。及至本年8月間，蔣介石考慮訓令黃埔學生籌設所謂“知行學社”之類的秘密組織，以“恢復革命鬥爭冒險之精神”，詳見：《事略稿本》，1948年8月18，21，23-24，28日條。
75. 〈蔣經國函蔣中正有人造謠攻訐當謹慎防範〉，1939年11月18日。參見：王良卿，〈“新人”與“起家”〉，頁342-350；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97-98。
76. 和1949年以後的經驗相較，兩人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緊張狀態尚不宜“直接”以蔣介石身後權力繼承的脈絡進行考察，這可能是兩段時期最大的分野所在。
77. 〈蔣經國函蔣中正徹底改組本黨〉，1945年2月25日。

## 四、地域、黨派與領導層的政治文化